

MPRA

Munich Personal RePEc Archive

Reform Debate: Economics of Speed and Passion

Xiaobo Pang and Weiting Huang

Jilin University

August 2008

Online at <http://mpra.ub.uni-muenchen.de/11564/>

MPRA Paper No. 11564, posted 14. November 2008 01:30 UTC

中国改革的“新政治经济学”：速度与均衡

庞晓波 黄卫挺

(吉林大学商学院、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长春 13001)

[摘要]速度与均衡是改革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有效达致,在非各态遍历的经济变迁过程中,时空依赖实质上是改革决策的基本约束。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巨大成就决非偶然,时空嵌入和非遍历性原理与“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指导思想是一致的,中国改革过程同样嵌入于时空,并且表现出特殊的时空压缩性,改革的速度与激情(均衡)所折射的和谐之美体现了经济变迁的动态适应性效率。

关键词:非遍历性 中国改革 时空维度 适应性效率 速度与均衡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Reform Debate: Economics of Speed and Passion

Pang Xiaobo Huang Weiting

(Jilin University, 130012)

Abstract: In term of time and space, economic changes are non-ergodic, reform speed and equilibrium is determined b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ime and space. The great achievements of China's gradual reforms are by no means accidental, time-space dependence and non-ergodic economic change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feeling our way across the river”, by time-space compression, China's gradual reforms have exhibited dynamic adaptive efficiency.

Keywords: non-ergodicity; reform; time-space; dynamic adaptive efficiency; speed and equilibrium

作者简介: 庞晓波, 吉林大学商学院、数量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卫挺, 吉林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通讯作者)

联系方式: 长春市吉林大学前卫南区东荣大厦商学院, 130012

电邮电话: hwt@email.jlu.edu.cn, weiting.huang@yahoo.com.cn

本文入选“改革开放30年暨孙冶方诞辰百年纪念经济理论研讨会”, 2008年10月, 上海财经大学。修改稿将由吉林大学出版社于近期出版。 *This paper was presented in the seminar held i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nd will be published as a book chapter by Jilin University Press.*

毫无疑问，20世纪人类最惊心动魄的事件莫过于跌宕起伏的全球性经济社会体制变革，不同国家的改革历程与成败得失给人类历史留下了浓重但多少又有一些迷惑的凝思。围绕市场经济转型，经济学家和相关领域专家都热衷于对比两种模式——俄罗斯的“激进式”改革和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并且为此展开激烈讨论，目前的事实，尤其是中国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明显为渐进式改革赢得了更多的赞誉。因此，留给我们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两种模式下的结果，如何从理论上诠释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研究这个问题的价值在于：一方面，认清渐进式改革成功的必然性和规律性，有助于为进一步推进中国体制改革提供指导性原则，提高体制改革的动态效率，避免走弯路；另一方面，也能够从中挖掘出经济制度变迁的某些规律性因素，这对于指导制度变迁实践和丰富经济学理论都将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外围绕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的讨论已有很多。例如，樊纲（1993）通过对不同的体制改革成本进行划分，利用成本收益比较论述了不同改革成本与改革方式、改革“激进程度”之间的关系，指出了渐进式改革在一定成本条件下的最优性。哈勒根和张军（1996、1999）在他们合作的论文中对改革初试条件、改革速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地研究，他们应用博弈论和实证分析，说明了在转轨国家中所观察到的经济改革速度是这些国家改革初始条件的函数，改革速度具有内生性。樊刚和胡永泰（2005）以改革速度和部门协调为线索，对体制转轨的最优路径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改革的“平行推进”概念。王永钦（2006）则对渐进转型的微观机制进行了研究，从劳动分工和微观治理机制的角度出发，认为渐进式改革成功的关键原因在于关系型合约没有遭到很大程度破坏。著名转轨经济学家罗兰及其合作者（如 Dewatripont、Roland，1995；Castanheira、Roland，2000，罗兰，2002）也在一系列论文中考虑大规模经济改革过程面临的不确定性、政治约束等因素，对“改革包”（Reform Packages）设计、最优改革速度、改革次序等进行了详细论述。

本文认为思考改革的合理性必须从改革的最基本构建纬度出发，即时间与空间的综合角度，在时空纬度内，经济变迁过程的时空依赖，以及由此产生的变迁过程非遍历性是揭开改革迷思的逻辑分析框架，中国改革的成功，是在非遍历性规律下改革速度与均衡有效达致的结果。

一、非遍历性与改革模式之争

1、经济变迁过程的非遍历性

改革始终是一种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变迁过程，经济、政治和社会部门总是紧密联系并相互交织在一起，从而构成了波兰尼（[1944]，2008）的嵌入性结构。经济、政治和社会部门之间的这种空间性嵌入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格兰诺维特（[1985]2007）在波兰尼的理论基础之上正式阐述了嵌入性概念在经济行动中的重要作用，从而构建出新经济社会学的学科基础。经济学中，这种部门之间的状态空间依赖已经得到了广泛的研究，比如法律与金融研究、政治体制对经济过程影响、社会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与促进作用等。另外，经济变迁还存在过程纬度，表现为时间上的路径依赖，沿用嵌入性的观点，称为时间嵌入性。时间嵌入性在历史社会学研究中是个默许的假设，而它在经济学中的复兴则归功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演化理论、路径依赖理论都是时间嵌入性的深刻体现。

当我们从上述时空嵌入性出发审视经济行动和经济变迁过程时，新古典经济理论暗含的（各态）遍历性假设将不再成立，并将导致其理论和实证研究范式遭到严重质疑，特别是实证研究，失去遍历性前提将导致其存在的合理性危机。所谓遍历性存在两重含义：在固定时间点上，系统运行过程必须存在一致的空间平均水平（space averages）；在无限延展时间轴上，系统运行过程的时间平均值（time averages）也必须保持一致。因此，若称某过程是

遍历的，其空间平均和时间平均都将趋于收敛。对于经济体系的运行过程来说，遍历性意味着经济体系存在一个稳定的内在结构，并且始终可以应用某种理论解释经济过程，历史数据能够为未来经济决策提供有用且安全的指导，即经济系统将表现出一种永恒的、无历史的和不可变的过程特征。保罗·萨缪尔森曾经强调遍历性对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性，并认为这是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的前提条件，但正如肯尼斯·阿罗、罗伯特·卢卡斯以及道格拉斯·诺斯等经济学家所指出的，由于存在弗兰克·奈特意义上的纯粹不确定性，以及经济行动的时空依赖性，非遍历性才是普遍存在的（转引自诺斯，[2005]2008）。

对于经济变迁过程中的非遍历性，诺斯（[2005]2008）和其他学者都有过详细的论述，他们认为经济运行体系的复杂性与经济行动者的有限能力是非遍历性的缘起。对于现代经济来说，非社会化的经济部门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系统，时至今日，我们对其基本构成单位（诸如企业、货币）还知之甚少；而一个嵌入社会政治体系中的经济体系更是庞杂难辨，虽然已经有学者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但想要明了个中机理，在有限认知的能力局限下只能是乐观主义者的情怀所至。当然，这里并不是宣扬不可识论，而是说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部门不断相互纠葛和嵌入的过程中，任何部门的变动都会演绎出不同的总体运行轨迹，因此，在有限认知的约束下，这种空间上的易变性将决定潜在路径的开集特征（发散、不确定性）。上述观点暗含了时间嵌入的路径依赖观点，只有存在路径依赖，经济变迁的空间易变性才会凝华为时间路径的唯一性。实现路径的唯一性与可能路径的发散性之间存在的差异取决于经济行动者处理纯粹不确定性的能力，其中最重要的是认知能力，这也是为什么诺斯在论述经济变迁过程中大篇幅讲述人类学习与认知体系的原因。

2、改革的真伪命题：逻辑与模式

当认识到经济变迁过程的非遍历性之后，我们就可以对改革中的一些命题进行评判，其中，最重要的是模式与逻辑之间的真伪评判。对于改革来说，非遍历性将导致技术模式之争成为一个伪命题，如果说真的存在改革模式，那么其真正含义应该是改革逻辑的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在全球改革与转型长波中，无论是哪个国家或地区，改革都必然或多或少地嵌入于全球经济政治体系，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开放。从全球经济体系来看，要想获得国家竞争优势，吸引跨国资本，获取分工带来的专业化收益，必须将国际产业转移规律、国际贸易分工特征、经济地理等作为改革战略的重要决策变量。从改革的经济体内部来看，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创建经济运行过程与现代化进程中的可持续激励体系，其中产权制度被认为是激励体系的根本所在。根据以上两点，埃尔玛·阿尔特瓦特（Altvater，1998）指出转型国家改革的两个重要纬度：开放程度与现代化程度（对私有部门的倚重），改革的目标是走向开放与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改革目标指出了行进方向，但这并不代表已经确定了改革的现实路径，或者说改革的技术细节。当经济、政治和社会以三重螺旋方式纠结在一起，并在时间纬度内进化演绎，改革的技术过程就必须遵循“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则。

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下的不同改革模式——俄罗斯激进改革和中国渐进改革一直是“改革比较学”的典型样本。然而，正如吴树青（2005）所指出，简单地用激进改革和渐进改革来区分原苏联东欧国家同中国的改革不仅是远远不够的，而且是十分肤浅的，二者的区别本质上是对改革的性质和目的有不同的理解，是指导改革的理论基础的不同。俄罗斯的改革实质上是在西方主流意志驱动下的自上而下瞬间巨变，其改革过程是通过移植西方的自由经济模式取代原有的计划经济体系，政府作为这种改革指导思想的接受者并将其灌输给社

需要指出，本文并不否认经济行为的某些方面存在遍历性，但从经济体制变迁，尤其是改革的角度来看，本文坚持非遍历性，欧洲，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分流”（彭穆兰，2004）就是世界非遍历性的一个历史佐证。

会。中国的改革则是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有机结合的探索性创造过程，其核心是市场经济理论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的本土化实践过程。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基本策略是“摸着石头过河”，政府更多地像一个艺术家，其最主要的功能是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多方利益与诉求进行权衡，从而出台相机性的改革政策。

俄罗斯改革迷信经济模式的可移植性，当西方学者按照美国的经济模式为其开出一系列改革药方时，改革便试图挣脱其所在的特定时空约束而独自成行。但是，经济变迁过程的非遍历性是对经济模式可移植性的直接否定，虽然改革设计者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制造改革所需要的国民认知教化和舆论素材，但这种认知只能停留在感性阶段，无法形成理性的行动认知。因此，改革过程仍然始终无法超脱时空约束，正如现实所呈现的，俄罗斯的改革过程并没有象预先设计的那么展开，各种改革制约因素十分强大。可以明确，根据新古典一般原理人为设计的改革最优解在特定时空约束下将不再有效，现实中很多国家的改革受挫都可以归结于此。反观中国的渐进改革过程，由于整个过程一直浸染于经济、政治和社会互动的大系统中，改革初期的全国大讨论为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而改革的渐进性为所有人认知、学习、思考和适应改革新问题和新情况提供了操作的时间和空间。总体来说，中国的改革是根植于特殊国情，综合考虑国内外各种约束条件的有序进阶过程，改革的速度与力度内生于整个经济、政治和社会系统的互动和演进过程，改革表现出一种动态的适应性效率。

嵌入于时空的经济系统复杂性与改革行动者的有限认知共同决定了改革与经济变迁过程的非遍历性，这导致了所谓改革模式成为伪命题，也决定了那些忽视改革时空约束，以他国经济体系为样本进行简单移植的改革策略受到严重挫折。相反，当经济、政治与社会部门以三螺旋结构纠结演化时，改革的真实逻辑和理路只能是在路径依赖和状态依赖约束下，综合考虑各部门的互动，以全局的战略目光把握改革进程，稳步有序的推进改革，从而走向动态有效的改革路径。“摸着石头过河”才是改革的真命题。

二、时空压缩下的中国改革战略

中国改革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逻辑指导下已经成功到达而立之年，所取得的成就更是给了世界一个“震惊”。回望三十年历程，我们必然会思考以下几个议题：改革速度与质量，改革原动力。根据上文，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必须置于改革的基础社会构建——时间和空间结构，只有立足于中国改革的时空特性，我们才能真正把握和处理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承受度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从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此，不管是对过去改革历程做出评价，还是期许未来改革盛况，我们都必须先对中国改革的时空特性有所了解。

1、中国改革的时空性质

时空特性是改革发展过程中最基本，也是具有建构性的制约因素。对于中国改革，不仅要考虑时空纬度的外部一般性特征，更要考虑内在的特殊性。在发展理论中，安东尼·吉登斯的时空延伸（Time-space distancing）和戴维·哈维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有时也称为时空收敛）经常被论及，它们是两个相互对立的概念，代表了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两种基本时空结构（转述自景天魁，1999）。

工业革命之前，农业社会的静谧和散漫在时空结构上表现出沉稳和十足的系统惯性，经济社会变迁速度相对较慢，不同国家之间基本处于封闭的自我供养状态。因此，传统社会一般表现出地域性、内向的，倾向于强调和固守自己的特殊性，即时间上的高度延续性和空间上的相对割裂性。但是，工业革命打破了这种时空传统，它所诱发的是一场时间加速、空间联结的结构剧变过程。在时间的不断加速过程中，变化成了唯一真正的不变，并引致了经

济社会的高度不确定性；空间上的联结形成了全球化，不管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等诸多方面，空间域的激荡已经即成事实，经济一体化的渐成，国际组织的出现以及不断上演的“文明的冲突”都是全球化过程中独有的剧目。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的国家和个人都被这种时空压缩所笼罩，这构成了中国改革的外在的时空一般性。

时空压缩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全球性基础约束，也是中国改革的一般时空构建，然而从中国改革的现实出发，时空压缩还表现出独有的特征。西欧的经济社会发展历程是一个前期缓行后期加速的连续过程，在整个变迁过程中，历史、现在和未来之间有着充分的对话，百年历程，百年磨合，行进的时空和空间都较为充裕。然而，对于中国改革来说，所要做的是用短短几十年时间去走完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后工业化路程，因此，中国改革是在压缩时间的基础之上再压缩。在空间纬度上，中国改革的外部空间是西方世界制造的所谓现代化语境下的国际秩序，中国不可能也没期盼过像早期的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外部攫取支撑内部的繁荣，相反，中国改革只能在既成霸权体系下通过有序开放市场，参与国际分工等非对抗性的市场手段与外部空间进行交换。中国改革的内部空间则体现在社会分层、产业结构以及经济地理等诸多方面，他们共同构成了改革的内在约束。除此之外，不管是内部还是外部空间，政治所投射的改革空间特征也十分重要，意识形态差异使得改革的外部空间受到更多不合理的挤压，而政治与经济纠葛也将对改革的内部空间产生巨大的约束作用。以上种种正是中国改革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时空嵌入特性，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改革的状态和路径依赖约束，从而决定了中国特色的改革之路。

2、中国改革的战略选择

改革战略是中国大战略体系中的一个核心部分，其重点是发展战略。在一般时空压缩约束和中国特殊国情的综合作用下，改革战略选择将成为求解动态约束最优化的系统规划过程。邓小平曾经指出，中国改革的过程就是一部“新政治经济学”的创作过程，它涉及到产权制度改革、对外开放、宏观经济结构、收入分配制度等众多方面。不管是基于改革的系统复杂性，还是改革过程的非遍历性，我们都不可能改革过程中的细节进行面面俱到的论述，因此，本文将从时间和空间纬度出发对改革进行战略性的宏观论述。

(1) 改革速度

从时间压缩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改革速度必然要快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问题的关键是到底多快的速度才是合适的，俄罗斯改革和中国改革的一个显著分野就是改革速度的不同抉择。在俄罗斯大爆炸式的改革过程中，速度的极化割裂了时间的连续性，历史不再是现在和未来回望的窗口，西方世界的现成模板成了其改革的取用素材。虽然马克思也曾提出过速度极化的可能性，即某些国家可以超越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但马克思同样也指出了这种可能性有赖于严格的条件限制和苛刻的成行约束，很多国家的社会主义梦断正是由于只看到了速度极化的可能性，而没有看到可能性背后的复杂条件。同样道理，当存在复杂的时间与空间约束时，改革速度极化只能存在于新古典经济学者多重前提假设下的比较静态框架内，正如诺斯（[2005]2008）指出的，对于现实的动态改革进程，新古典经济学无能为力。因此，在现实的改革情境中，速度极化无疑是个糟糕的想法。

毫无疑问，速度极化不应也没有成为中国改革的时间战略，同样，中国改革也不应该采取蠕行策略，改革速度的唯一标准应该内生于改革过程。可以明确一点，时间压缩要求改革必须具备一定的加速度，但是，速度的快慢最终取决于经济、政治与社会的互动过程，正

《文明的冲突》是美国哈佛大学萨缪尔·亨廷顿于1996出版的著作，该书出版之后的“911事件”是文明冲突的典型事件。

这里指的是1984年邓小平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

所谓必须做到“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承受度”的三度和谐统一。改革首先需要确立其合法性地位，即要不要改革。农村改革拉开中国改革的序幕，从散点实验的“包产到户”到最后以正式文件发布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改革是中国国情与社会现实的历史必然，它充分体现了中国改革的多部门协商和系统互动过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局部尝试是这种系统协商互动的延续，减税、让利、扩权等一系列措施在提供经济激励的同时也牵动利益部门、社会舆论、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互动与协商。在非遍历性的前提下，这些过程是无法确切预知的，历史给了我们很多深刻教训，激进的改革派往往会被保守派和即得利益部门绊住手脚而无法前行，改革的狂热更要付出沉重的社会成本。因此，在不断摸索和多部门协商过程中确立改革的合法性是一个全局的优化抉择，虽然这个过程只在局部展开，但在路径依赖与时间依赖条件下它是系统帕累托有效的。

如果说改革合法性确立只是一个起点，那么改革合理性问题无疑是观察改革速度和质量的最佳情境，特别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之后，合理性意味着我们必须思考“要什么样的改革”，改革的“理”到底是什么？在合理性问题上，速度与质量是统一的。以现阶段关键的汇率改革为例，在美国的逼迫策略下，人民币升值是一个趋势，但是人民币升多少，如何升却是一个不断讨价还价的过程。首先，理论上升值幅度的确定固然取决于汇率错配的程度，但在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大系统下考虑这个问题，实际升值幅度还受到各种利益部门的影响，首先，国家内部利益部门之间的协商与讨价还价将确定一个内部汇改策略，在此基础上，国家之间再出于国家利益考量进行汇率博弈。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汇改所受到的制约无疑会很多，作为部门利益的公共代理（common agency）——政策制定者必须考虑各利益冲突部门的相关诉求，避免汇改对产业发展造成剧烈的影响。因此，一蹴而就的汇改策略是不适用的，只有采取稳步有序的升值策略达到时间和空间上的置换，才能尽可能熨平汇改的冲击效应；当然，升值的速度还受到汇率投机的影响，所以综合考虑和权衡所有这些方面的制约因素，才能有效把握汇改的速度。

（2）空间战略

中国改革的空间战略存在全球和国内空间两个层次，在空间联结的背景下，内外空间的战略选择必须趋于一致。全球化是改革空间战略最重要的前提约束，这直接导致了改革必须与开放紧密结合在一起，将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洞见中产生。因此，经济运行必须走出自足自给状态（autarkic economy），经济发展战略必须对全球经济格局作出反应，这意味着改革的产业战略、空间布局等必须避免陷入封闭的思维陷阱，而应该从开放经济的理论视角去思考。

对外开放已经成为改革过程中最重要的空间战略，目前，中国已经开始了从窗口式开放到纵深挺进的阶段转换。从经济地理学的角度，开放的布局与次序选择必须考虑由此带来的区域效应。从外部空间的角度来看，对外开放布点必须选择具备物流运输等区位优势的地方，这直接决定了为什么开放窗口选择沿海城市；而从内部空间来看，这种地理布局所要考虑的问题将复杂的多。本文认为，区域效应所带来的区域收入差异、劳动力及其他要素迁移、城市化等是我们应该考虑的主要问题，他们直接涉及改革的公平与效率。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在中国的窗口式开放过程中，也会不可避免地发生一定程度的区域贫富差距过大、三农问题、过度城市化和乡村边缘化等问题，如何有效处理开放成果的普惠将成为改革者面对的最棘手问题。很显然，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窗口式的开放策略，是一场制度倾斜诱发的社会过程，因此当窗口式开放已经达到预期收益时，必须考虑其带来的社会成本，让对外开放向纵深挺进。当然，社会系统具有强大的惯性（路径依赖），即使做到政策平衡，也很难停止问题的继续，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国家没有成功治理这些问题的原因之一，因此，需要给予特别的关注。

地理版图是空间战略的一个浅层表现，对于改革和经济发展来说，深层次的是经济版图的空间战略选择。在空间联结的过程中，当代全球经济版图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生产全球化、市场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以及技术信息全球化，它们各有特点又相互影响，共同决定了发展战略的选择。生产全球化的背后是制造的全球分工与协作，在现代化的部分重型工业部门和高新技术产业中，多国制造与统一装配已经成为一种新兴的制造模式。市场全球化则意味着竞争格局的变化，它既扩大了外部市场空间也加剧了内部竞争程度，地理疆域已经不是经济活动的边界。四个特征中，金融全球化表现地最为凶猛，随着信息技术的推进，电子金融、金融数字化得以成行，全球资本流动从来没有像今天那么快捷、频繁和大规模，它既提高了金融体系的效率也增加了全球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技术与信息全球化的直观表象是网络的无国界性质，但从经济意义上来看，专利法案、技术垄断等旨在激励技术创新的制度因素使得技术无法真正做到全球化。

上述四大特征将综合决定改革的经济空间战略选择，而选择的根本标准是要遵循比较优势。欠发达国家（开放经济）的重要特征是劳动力相对充裕，资本相对稀缺，由于市场的全球性特征，他们所面对的往往是发达国家的竞争，结合禀赋特征其合理的选择是应该进入劳动相对密集型的产业，而不是资本相对密集型的产业。林毅夫（2004）对此有过详细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他认为一些欠发达国家改革的失败是因为错误的推动赶超战略，期望在短时间内采取最先进的技术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这里，林毅夫之所以强调技术问题，是因为技术的全球化并不是无障碍的，技术通过寻租换取资本，而这将进一步加深发展中国家资本的稀缺程度。对于中国改革来说，不管是参与全球分工还是走向国际竞争，正确认识比较优势都至关重要，“中国制造”的全球攻势正是其鲜明写照。当然，上面的论述并不是彻底否定重工业化，相反，从时间的动态角度来看，比较优势也有其时间轨迹，改革也面临着产业与技术升级。随着改革不断深入，资本积累的过程也是内生产业升级的过程，其中体现了动态的适用性效率。另外，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的逐利性会自觉地寻求增值空间，外部资本与本地要素的结合也成为产业与技术升级的一个重要机制。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两种升级途径一直并行不悖，既有来自于内部的自我产业革新，也有来自外部资本的溢出效应。

以上从宏观角度对中国改革的时空特性以及在此背景下的改革战略进行了论述，在时空压缩的背景下，中国改革既要达到速度上也要做到空间上地有效把握，即同时寻求改革的“速度与激情（均衡）”，从而达到时空纬度上的动态适应性效率。需要指出的是，为了论述清晰，本文在结构安排上将时空分开，但事实上两者是紧密不可分的，时间和空间之间存在着互换机制。

三、中国改革的现实评价与展望

中国改革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逻辑指导下，充分考虑改革的时空压缩特性，历经 30 年成功实现了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状态到全方位有序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回望 30 年改革历程，中国并不存在事先的改革蓝图，而是根据历史、社会大系统的互动变化相机性地推出有效改革措施。可以说，中国改革是经济变迁过程非遍历性的一个历史写证，是时间与状态依赖条件下成功改革的一个生动案例。当前，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迁至全球前列，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改革，其嵌入的时空已经发生改变，因此势必会遇到很多新问题新情况，这就要求我们首先作好认知层面的准备；与改革的任何一个阶段一样，虽然问题的形式多种多样，但从根本上讲，认知体系建设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了寻求改革的适应性效率与建设和谐社会，综合考虑经济、政治和社会大系统的时间与空间特征，中国改革与经济建设的下一阶段主要任务有：继续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

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处理好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的协调，有效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制度建设，提高政府与制度的运行绩效；协调城乡、区域发展，提高改革的普惠性。

1、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目前，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到了面临结构性调整的阶段。首先，从地理布局来看，窗口式的开放格局所带来的社会成本负担越来越重，沿海与内陆之间各项经济社会差异越来越大，因此，对外开放必须进行布局调整，在提升沿海开放的同时，加快内陆开放，实现对外开放的纵深推进。其二，优化商品贸易结构。低廉的劳动力缔造了中国制造的出口王国，但与进口商品相比，贸易品的低附加值一直成为中国制造的软肋，并且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份额较大。通过 30 年的改革积累，中国所面对的比较优势已经渐渐改变，在新的历史机遇下，只有优化对外贸易结构，鼓励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产品出口，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档次及附加值，努力促进对外贸易从数量增加为主向质量提高为主转变，才能更好的参与国际分工，提高本土企业在国内外经济活动中的主导权，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其三，积极应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构带来的冲击。随着一体化的欧洲以及其他大国的沉浮，美国主导下的单极全球体系正被多极化的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所取代，在这场国际秩序的重构过程中，中国需要有自己的声音。在经济领域，大国之路不仅表现在国民财富的总量上，货币国际化、资本市场开放等都是重要的特征。因此，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还包括其他非贸易部门的深化。

2、始终有效处理增长速度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

经济增长的“好”与“快”是增长速度与质量的体现，本文的大部分篇幅都在对此进行论述，即所谓“速度与激情”。由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系统的复杂性，改革过程的非遍历性，两者关系的有效处理需要结合不同阶段的时空特征进行综合考虑。因此，到底是“又快又好”，还是“又好又快”是一门艰深的艺术。由于特定的时空特征，在过去的改革历程中，中国经济基本上是遵循“又快又好”的发展原则，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平均 8% 以上的速度增长，经济总量跃迁至世界前五的行列。但是，这种高增长的背后也存在很多问题，粗放型发展方式以及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的增长模式都影响到了增长质量。新的时空特征对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发展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本文认为，只有切实完成好以上几个转变，努力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改革过程的动态效率。

3、提高政府与制度的运行绩效

正如刘易斯、诺斯等所指出，经济增长的根源在于制度，制度决定了经济行为。在任何经济体中，政府本身是最重要的制度，它决定了经济中企业面对的宏观激励结构（林毅夫，2004）。本文曾经指出，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创建经济运行过程与现代化进程中的可持续激励体系，即把激励搞对，让市场起作用。因此，继续提高政府与制度的运行绩效仍然是下一阶段改革的重要内容。结合目前的改革现状，政府与制度建设的重点仍然应该集中在：着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深化资源要素价格改革，从制度上保障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发展方式的尽快转变；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规划、财税、金融、投资体制改革，完善宏观管理体制。需要

重点指出的是，在政府与制度建设方面，最根本的还是要继续完善产权制度改革。

4、提高改革的普惠性

国民收入分配体系是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改革的普惠性已经成为衡量改革有效性的重要指标。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中国改革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收入分配不均衡现象，区域发展差距拉大、城乡发展不协调以及部门利益失当是其中最重要的国情。这种地理与经济空间上的失衡将直接透过政治、社会部门作用于经济发展，从而制约下一阶段改革进程。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必须更加重视社会领域的改革和相关制度建设，加大国民收入分配关系调整力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从制度上保障社会公平，使发展改革成果最大限度地惠及全体人民，促进社会和谐。根据当前改革的形势，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在城乡协调发展问题上，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农村市场和农业服务体系。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只有稳步推进以上几方面的改革，才能实现改革的动力不衰竭，改革的路径有效率，才能真正达至时间与空间上的速度与激情。可以说，改革的速度与激情(均衡)所折射的和谐之美不仅体现了经济变迁的动态适应性效率，也体现了人类理想、公平正义等人文社会情怀，改革过程事实上是经济、社会与政治部门的综合治理过程。

参考文献

[1]Altvater Elmar, 1998, "Theoretical Deliberations on Time and Space in Post-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Regional Studies*, Vol.32, No.7, pp.591-605.

[2]Castanheira M. and G. Roland, "The Optimal Speed of Transition: A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Vol. 41, No. 1, (Feb., 2000), pp. 219-239.

[3]Dewatripont M. and G. Roland, "The Design of Reform Packages under Uncertain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5, No. 5 (Dec., 1995), pp. 1207-1223.

[4]Granovetter Mark,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1, No. 3. (Nov., 1985), pp. 481-510.[中译文载格兰诺维特·马克：《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5]Polanyi Karl,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中文版由冯刚、刘阳译，2007年，浙江人民出版社]

[6]North C.Douglass, [2005],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中文版由钟正生、刑华译，200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7]樊纲：《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模式》，《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

[8]樊纲、胡永泰：“循序渐进”还是“平行推进”——论体制转轨最优路径的理论与政策》，《经济研究》，2005年第1期。

[9]哈勒根、张军：《改革起点与改革路径：一个可行的模拟》，《经济研究》，1996年第1期

[10]哈勒根、张军：《转轨国家的初始条件、改革速度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1999年第10期。

[11]景天魁：《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6期。

- [12]林毅夫：《自生能力、经济发展与转型：理论与实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 [13]罗兰·热若尔：《转型与经济学》，张帆、潘佐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 [14]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
- [15]王永钦：《市场互联性、关系型合约与经济转型》，《经济研究》2006年第6期。
- [16]吴敬琏：《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7-12页。
- [17]吴树青：《两种改革两种结果》，《求是》，2005年第4期。